

周作人的最后22年

变节的知堂主人 在一九四五—一九六七年大时代的长廊中寂灭

耿传明◎著



K825.6
112



周作人的最后22年

耿传明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SBE 30/0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作人的最后 22 年 / 耿传明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5.4

ISBN 7-5034-1626-2

I. 周... II. 耿... III. 周作人 (1885~1967) —生平事迹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9592 号

责任编辑: 韩淑芳

封面设计: 80 零 · 小贾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

印 刷: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**邮编:** 101402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: 19.25 **字数:** 225 千字

印 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34-1626-2/K · 1104

定 价: 28.00 元

(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)



敬文东

20 世纪的中国一方面多灾多难，一方面又充满了变数和希望：这两者都绝好地汇聚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。知识分子是 20 世纪中国的标本，解剖知识分子就是解剖 20 世纪的中国；分析知识分子，就是分析中国的 20 世纪。这就是我们这套丛书能够得以存在的最大理由；也正是这个理由，能保证读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认真地审视中国的 20 世纪和 20 世纪的中国。

在这些知识分子群落中，有作家、诗人、历史学家、翻译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；有革命斗士、自由主义者、新儒家的代表，也有汉奸文人。他们的

命运折射了中国的命运。他们都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历史，也有过属于自己的耻辱和充满变数的命运。但无论是辉煌历史、耻辱还是充满太多变数的命运，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入口处回望前尘和来路时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一切都不再单属于个人，一切都将、都已永久性地属于20世纪的中国，属于中国的20世纪。

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他们的心路历程，不是为了向历史撒娇，更不是为了向历史索赔，甚至不是为了简单地证明谁对谁错，而是为了保证今天和明天的我们活得更理智、更聪明、更幸福、更踏实。先人的错误或光荣如果不能被我们清楚地分辨，我们就是不合格的子孙；20世纪的遗产如果不能被有效地清点，21世纪就有可能是变了形的20世纪，时间就有可能在流动中处于静止的状态。我们再也不需要这样的悖论，而我们曾经确实受制于这样的悖论。事实上，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拥有晴朗的天空，我们还没有全方位地愧对先人，靠的就是我们对遗产的清点，对错误的洗涤，对光荣的分辨。

我们并不是注定热爱遗忘的民族，只是有些事情我们羞于提及，宁愿将它埋在内心的最深处；实际上，我们是热爱在内心深处进行考古研究的民族，因为那些深埋内心的事情总是被我们一次次地咀嚼，无论是午夜梦回还是其他一些独处的时刻。尽管发掘过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指向光辉的前程，但这也同样不能从逻辑上证明我们的内心考古学毫无意义，也没有能力宣布内心考古学完全失效。这套丛书不过是内心考古学偶尔的文字表述而已。它仅仅是冰山理论的一个小例证罢了，因为还有更多的东西来不及出土。任何一个公正而心怀善意的读者都将不难看出，这里边没有哀悼，没有凭吊，没有唁电，也没有其他任何不良爱好；反抗遗忘、指向未来、歌颂美德和力求聪明，才是内心考古学的本意。我不敢说这本意已经得到了完美的实现，但本意被表达出来却是这套丛书追求的首要目标。其他的一切都是后置性的东西。事实上，不带偏见的读者肯定会发现，这套丛书中的每一本的最后一页，遗忘都被击倒在地，内心考古学和它的本意却悄然站立了。

反思成了内心考古学的第一要务，但反思必须建立在事实之上：它需要反思者具有侦探一样的能力。西谚说，上帝也大不过一个细节。因为只有细节才能证明上帝。同样，反思的正确与否必须要征得无数细节的认同和首肯。因此，所谓的内心考古学，不过是发掘细节。在此，细节的意义要么是不重要的，要么就是意义早已溶解在了至高无上的细节之中。但不能因此认为这套丛书只是细节的罗列和堆砌。鉴于上面说过的原因，它也提供意义。但那是融细节和意义于一体的意义。在这里，所谓意义，是充满细节的意义，所谓细节，是充满意义的细节。这保证了内心考古学的实现，也保证了反思的有效、诚恳和善意，当然还有深度。

感伤是没有用的，悲观主义是一条绝路，积极和乐观才是我们的必须品。反思意味着乐观，内心考古学则指称着积极。没有这样的品质，反思和内心考古学将共同归于失败。这套丛书的作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各自表达了自己的积极和乐观。他们努力将20世纪的一些蛛丝马迹摆在了我们面前，努力将过去了的中国的某些角落摆放在了我们的眼前。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指向今天和未来，所以他们的忧患已经不再是忧患，而是特殊形式的乐观。他们辩证地将忧患和乐观融在了一起。在这套丛书中，忧患是乐观的忧患，乐观则是忧患着的乐观。因此，这套丛书有效地将矫情给最大限度的抑制住了，也将任何性质的抱怨踢出门去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套丛书正好接续和推演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。愿以此与读者诸君共勉。

2005年3月2日



1	引 子	末日到来的征兆
4	第一章	乙酉年的惶恐
33	第二章	“日暮途穷剧可哀”
86	第三章	老虎桥监狱的囚徒
124	第四章	“菰蒲零落满溪间”
149	第五章	阳光下的劳作
201	第六章	“粘泥絮”与“未摘花”
244	尾 声	“香泥成篆复成灰”
260	附录一	周作人著译作目录
265	附录二	周作人生平年表
292	附录三	周作人研究资料索引辑要
296	后记	



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，一架以机长母亲的的名字“埃诺拉·盖伊”命名的美军B-29超级空中堡垒飞机，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，两分钟之内，广岛市6万多人死亡。

1945年8月8日，苏联向日本宣战。9日，苏联红军越境进入中国东北，与日军开战。同日，美国向日本长崎投了第二颗原子弹。

1945年8月8日，日本政府在天皇皇宫地下室举行了一整天的会议。内阁与军部中的主和派与主战派仍争执不一，44岁的裕仁天皇做出裁决：在本土决战准备不足，决定接受美、中、英三国令日本

投降的《波茨坦宣言》，结束战争。

10日，日本政府通过广播与中立国，将天皇的决定通知盟国。

随后，盟国方面表示：可以考虑保留日本国体的天皇制。

14日，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再次确认其“圣断”，并于当夜录制了天皇宣布的《终战诏书》。

8月15日中午12时整，日本国内所有的交通停顿，全体国民屏声静气地在听日本天皇裕仁以低沉、漠然的语调宣读的《终战诏书》。

1945年8月16日下午5时，在南京伪政府主席官邸、伪政府部长以上的要员全部聚集在一起，开了伪政府最后一次政治会议。

会议由伪行政院长周佛海主持。周佛海望着台下一张张沮丧、黯然的面孔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现在开会！先请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陈公博先生讲话！”

陈公博走到主席台前，扫视一眼，说道：“从今天起，诸位不要再称我陈主席了。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，以后就叫我陈先生吧！”他顿了一下，提高嗓门：“日本已经宣布投降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政府理应解散！现在，我宣布三项决议：解散国民政府，中央政治会议改为临时政务委员会，我任委员长，周先生任副委员长，中央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。”

说到这里，陈公博的目光又朝众人扫了一遍，只见所有的人都像霜打了一般，面无表情。“树倒猢猻散”，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啦。

陈公博又说道：“下面，请周先生宣读政府解散宣言。”周佛海起身朝台下一鞠躬，开始宣读《国民政府解散宣言》：

……吾人目睹祖国半壁河山被日军侵占。亿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惴惴不安。故迫于时会、以一种特殊方式救亡图存，以不得已之手段早日结束中日战争、兹于五年前在南京组建国民

政府。

今则日本政府已投降，世界已恢复和平，而国家之独立自由，与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却无异致。今日国家应复统一，而吾人之使命亦已告终，自即日起宣告解散南京国民政府。

周佛海念完后，众人又是一片沉默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有一个人指出“宣言”里几个字要修正。接着，就举手通过了。

陈公博转脸又对周佛海说：“是不是让诸位分组讨论一下会议精神？”

此时已另外寻找到靠山的周佛海脸上露出嘲笑的表情，说道：“还讨论什么？反正就是那么回事了。”说完，一拂袖子，扬长而去。

陈公博遭此抢白，脸被气得铁青，然也无可奈何，他望着周佛海的背影狠狠地瞪了一眼，转身朝众人道：“散会！”

从1940年3月30日建立到1945年8月16日宣告解散，这个汉奸政权前后经历5年4个月又17天，终于寿终正寝。另外，名义上接受汪伪南京政府领导实则具有半独立状态的华北敌伪政权——伪“华北政务委员会”，已于日本投降的当日8月15日宣布解散，等待国民政府接收。华北伪政权存在的时间从1937年12月14日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之日算起，存在了7年半的时间。



1

1945年10月6日，即日本投降之后一个多月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通知军统局局长戴笠，逮捕华北高级汉奸。戴当日在北京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家中，用宴客方式，将华北“特任级”汉奸予以逮捕。在日本投降后，当时在北京的汪伪政府的“特任级”汉奸有：

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；

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；

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、王荫泰；

最高顾问咨询委员曹汝霖，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、杜锡钧；

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、王谟；

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

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；

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，“伪政务委员”兼北京特别市市长刘玉书，伪“政务委员”兼总务厅次长祝书元；

咨询委员兼北京物价处理局局长汤芑铭；

担任“简任”伪职而职务重要的有：

内务总署署长吴瓿；

北京宪兵司令黄南鹏等。

这些人中间，除了王揖唐、董康托病住在医院，祝书元因办理交代“有功”，李宗仁从逮捕名单中给予消除，吴瓿先期逃避，汤芑铭因为汽车发生了障碍未能及时赶到以外，其余都参加了汪宅的宴会。

那次宴会所备的酒菜据说极为丰盛。但这些赴宴的汉奸，见院内军警戒备森严，都意识到酒无好酒、宴无好宴。戴笠在他们匆匆吃完以后，拿出一份名单，向这些人宣布：“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，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。这是中央命令，本人不能做任何主张。”

周作人没有参加戴笠的鸿门宴，大概是他在日本战败后，就想完全恢复他纯粹的学者教授的社会形象，不愿再跟昔日的汉奸同僚们“酱”在一起了。但这也只是他的一相情愿：他很快就在北京八道湾11号的家中被捕了。

据说，当枪口对准周作人时，他只站起来平静地说：“我是读书人，用不着这样子。”随后就跟着军警走了。据周作人后来说，来执行逮捕任务的军警在抄家时，偷走了刻有“圣清宗室盛昱”六字的田黄石章一枚、摩伐陀（Movado）牌钢表一块，总价值七八百元。^①

①《周作人文选：自传·知堂回想录》第534页，群众出版社，1998年。

对于被捕，周作人虽然心存侥幸，其实多少还是有一点心理准备的，只是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。实际上，日本投降以前的大半年时间，周作人在北平的日子过得还比较平静。他对于日本的战败也有所预感。但周作人既将自己的命运与日本侵略者的命运连在了一起，此时此刻也就无可奈何，只能听天由命，不去想它了。以下流水账一样罗列出来的事例，可以揭示出周作人在日本战败前后的力求平静的心理状态。

1945年1月，周作人连着写了好几篇小文章，都是在讲年轻人应该学点国史、读点佛经，知道点动、植物方面的知识，了解点民俗学等等。总之，还是强调青年人要沉得住气，要懂得“人情物理”。比较重要的一篇文章是《关于宽容》，发表在同年2月12日的《新民声》报上。文中说：“在抱大志谋大事的人，往往能容忍较小的荣辱，这与一般所谓大度的人以自己的品格作衡量容忍小人物，虽然情形稍有不同，但是同样的以我慢为基本，那是无可疑的。”显然，这也是话中有话，也就是仍然要以“傲慢”的、“不辩解”的态度，来对待人们对他的种种指责——对他当汉奸的指责，这种指责早在他1938年与日方刚刚开始接触时就开始了。

1945年2月，周作人开始编辑他即将入狱前的最后一本文集《立春以前》，这也是他生前在大陆出的最后一本散文集。周作人编校完毕，还写下了这样的后记：

我写文章也已不少，内容杂得可以，所以只得杂以杂文自居，但是自己反省一下，近几年来可以找出两个段落，由此可看得出我的文章与思想的轨道。其一，民国二十九年冬我写一篇日本之再认识，正式声明日本研究店的关门，以后对于不懂得的外国事情不敢多开口，实行儒家的不知为不知的教训。其二，民国卅一年冬我写一篇中国的思想问题，离开文学的范围，关心国家治乱

之源，生民根本之计，如顾亭林致黄梨洲书中所说，本国的事当然关切，而且也知道的较多，此也可以说是对于知之为知之这一句话有了做起讲之意吧。我对于中国民族前途向来感觉一种忧惧，近年自然更甚，不但因为已亦在人中，有沦胥及溺之感，也觉得个人捐弃其心力以致身命，为众生谋利益至少也为之有所计议，乃是中国传统的道德，凡智识阶级均应以此为准则，如经传所广说。^①

显然，这也是话中有话。预感到命运不妙的周作人，仍然在强调一种“生存第一”的哲学，在有意无意地为自己辩护。只不过这种辩护和他平时说话一样，含蓄委婉，言在此而意在彼。

日本战败前，周作人在汪伪政府里担任的都是闲职，计有：国民政府委员、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、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、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等。

日本即将战败前的1945年3月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，伪国民政府特派王荫泰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，周作人仍被任命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。1945年4月16日下午，汪伪政府的代理主席陈公博及随行人员褚民谊、赵尊岳、丁默邨、周隆庠等，到北平视察，周作人赶到中南海迎宾馆迎接。送往迎来，也是为官者所难免的事，周作人既在官场，当然也得循常理办事。

1945年4月，周作人1943年南游时在苏州结识的一个朋友王予（徐淦），来到北平谋生，并在事前写信给周作人，请他介绍进北平图书馆或琉璃厂旧书店工作。周作人回信说：“鄙人退位（指辞去伪教育督办职务）以来已无力向图书馆荐人，厂甸旧书业萧条，当伙计维持不了生

^①《周作人文选1945—1966》第34页，钟叔河编，广州出版社，1995年。以下引自该书材料，只注明书名、页码。

活，似不如当家庭教师，在古城比较有机会，也适合足下的情形。”周作人此时虽还挂着几个闲职，钱不少拿，但已经没什么实权了。他在当伪督办时，确实曾安插过一些人在其所属的机关、学校任职，有的还是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人员。但现在他担任的都是闲职，已经无力为王子介绍职位。

这里值得介绍的一个细节是，王子到北平的第四天，忽然看见哈德门门外的德国饭店，灰溜溜降下了纳粹德国的国旗，与此同时，电台也广播盟军攻克柏林、希特勒自杀的消息。王子预感到时局将有重大转变，且挂念着南方的妻儿，于是又匆匆南归了。这倒也解除了周作人不能给他介绍职位的尴尬。周作人此时已是“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”了。

德国法西斯的覆灭想来也给周作人带来了相当大的恐慌。德国败了，日本也不会支撑太久了。这差不多是所有人的共识，周作人岂能不知。但世事如此，周作人也只好将自己继续埋进书堆，聊以消遣、解忧。

1945年6月，随着日本的覆灭越来越临近，周作人倒越来越把自己的兴趣转向了“纯学术”和“小趣味”，他编订了《北京竹枝词集》，写了《北京的风俗诗》的短文。文中介绍了北京竹枝词中，以咏风俗人情为主的风俗诗。周作人认为，“这一类竹枝词说大抵是讽刺诗并无不可，不过这里要不得那酷儒莠书的一路，须得有识谐的风趣贯串其中，这才辛辣而仍有点蜜味。”但“中国的风俗诗或谐诗”，“未曾有发达的历史，要那么理想的好自然也不容易”。看起来还怡然自得，隐士风范犹存，不大把时局的变化放在心上。

1945年6月30日，周作人写了《无生老母的信息》一文，这是他一直很看重的文章。与五四时期颇有“浮躁凌厉之气”的周作人不同，与20世纪30年代闲适、惟美，以“吃苦茶”来品味人生的“苦茶庵主”也有别，此时的周作人开始沉入到国民中去，对民间的生存状态、宗教

信仰，有了浓厚的兴趣和同情。我们不妨从这篇文章观察观察他此时的心境：

大概人类根本的信仰是母神崇拜，无论她是土神谷神，或是水神山神，以致转为人间的母子神，古今来一直为民众的信仰的对象。客观的说，母性的神秘是永远的，在主观的一面人们对于母亲的爱总有一种追慕，虽然是非意识的也常以早离母怀为遗恨，隐约有回去的愿望随时表现，这种心理分析的说法我想很有道理。不但有些宗教的根源都从此发生，就是文学哲学上的秘密宗教思想，以神或一或美为根，人从这里分出来，却又祈求回去，也可以说即是归乡或云还原。龙华经作者集红阳之大成，而重复提高老母，为老祖宗之至上者，这不特深合立教本义，而且在传道上也极有效力，是很大的成功。悟道心宗党性宝卷内有盼望歌云：“无生老母盼儿孙，传言寄信从费心，遍遍捎书拜上你，不肯回心找原根。”又销释收圆行觉宝卷内云：“无生母，在家乡，想起婴儿泪汪汪。传书寄信还家罢，休在苦海只顾贪。归净土，赴灵山，母子相逢坐金莲。”“无生老母当阳坐，驾定一只大法船，单渡失乡儿和女，赴命归根早还源。”销释真空扫心宝卷内云：

“劝大众，早念佛，修行进步。无生母，龙华会，久等儿孙。叫声儿、叫声女，满眼垂泪。有双亲，叫破口，谁肯应承。”这里用的是单词口调，文句俚俗，意思是父母招儿女回家，虽标称无空无，实在却全是痴，这似是大毛病，不过他的力量我想也即在此处。经里说无生老母是人类的始祖，东土人民都是她的儿女，只因失乡迷路，流落在外，现在如能接收她的书信或答应她的呼唤，便可回转家乡，到老母身边去，绅士淑女们听了当然只

觉得好笑，可是在一般劳苦的男妇，眼看着挣扎到头没有出路，正如亚跋公长老的妻发配到西伯利亚去，途中向长老说，我们的苦难要到什么时候才完呢，忽然听见这么一种福音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。不但他们自己是皇胎儿女，而且老母还那么泪汪汪的想念，一声儿一声女的叫唤着，怎不令人感到兴奋感激，仿佛得到安身立命的地方。……^①

依然是散淡的笔墨、平和的心境。但此时的周作人已不再是像以往那样，将这种愚夫愚妇们的信仰简单地视之为“蛮性的遗留”。而且对“母神崇拜”不乏理解和同情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难道他真的预感到了什么？其实，此时此刻的周作人，也和那些“愚夫愚妇们”一样，深切感受到了那种“失乡迷路，流落在外”的孤独与无助。毕竟日本即将战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，周作人对自己即将来临的命运也不可能不上心。这篇文章，只是他对自己动荡心神的抚慰而已。

2

论说，周作人与他一块共事的华北群奸在思想、文化上，并无多少共同语言，而且他也不太符合日本人选“汉奸”的标准。显然，日本人只是看重了他在知识界、教育界的“清誉”，因此加以利用而已。周作人当“教育督办”期间，华北沦陷区大、中、小学的毕业文凭上都盖的是周作人的大印，这就是说，以他过去的“清望”，周作人的确为日伪统治起到了“安定人心”、粉饰太平的作用。

周作人是五四“新文化”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，华北汉奸不但在政治上多是北洋遗老，在文化上也多是复古、守旧主义者，并且周作人并非无

^① 《周作人文选 1945—1966》第 93 页。